

红军长征:中华民族的千古绝唱

萧 致 治

(武汉大学 历史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萧致治(1929-), 男, 湖南武冈人,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摘 要] 红军长征是中华民族史上空前未有的创举。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 粉碎了蒋介石的围追堵截及路途上的艰难险阻, 终于胜利完成了战略大转移, 把抗日救国斗争推进到新阶段。

[关键词] 红军长征; 中华民族; 千古绝唱

[中图分类号] K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6)06-0669-07

70年前,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英勇队伍, 为了救国救民, 历尽千辛万苦, 跋涉万水千山, 战胜千难万险, 历时两年, 跨越11省, 行程25 000里, 终于由赣南达到抗日前线陕北。这就是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在中华民族史上, 这是绝无仅有的壮举; 在世界历史里, 这也是惊天动地的奇迹!

一、两种态度, 两样结果

20世纪30年代, 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威胁。东邻的日本帝国主义, 野心勃勃, 执意要吞并中国, 将中国沦为殖民地。早在1927年, 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就提出全面侵华计划, 声言“欲征服支那(中国), 必先征服满蒙; 如欲征服世界, 必先征服支那”。1929年, 世界爆发空前深重的经济危机。日本工业生产总值下降32.4%, 失业人口达300万, 各地罢工事件3 280起。日本统治者为转嫁危机, 缓和国内矛盾, 积极扩军备战, 加快侵华步伐。

1931年, 日本发动了侵吞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 1932年初, 又发动了攻打上海的“一·二八”事变, 并在东北建立傀儡政权“满洲国”。1933年, 日本侵占热河省, 同时把魔爪伸向冀东北与察哈尔省(今属内蒙)。1934年, 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发表声明: 日本对中国有特殊权利, 要求各国不要干涉日本侵华, 反对各国贷款给中国和向中国出售军火及派遣军事顾问, 公然将中国当作它的保护国。1935年, 日本增兵华北与内蒙, 同时收买汉奸、蒙奸, 制造“华北五省自治运动”, 企图使华北在“自治”幌子下, 变成第二个“满洲国”。日本的节节侵犯, 使中国亡国之祸迫在眉睫。冯玉祥感叹: “国事至此, 惨过于印度, 耻过于高丽。如不急谋补救, 来日大难, 实有不忍言及者。”^[1] (第1页)

日本的疯狂侵华, 中日矛盾迅速上升为最主要矛盾。如何应对日本侵略? 事关民族危亡和人民死活, 是对国内各党派的严峻考验。在这个关键问题上,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 采取的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 由此也导致两种不同的后果。

针对日本疯狂侵略, 中国共产党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摆在首位, 高举抗日救国旗帜, 积极推进全国抗日运动。“九·一八”事变的第三天, 中国共产党即发表宣言, 斥责“日本帝国主义是压迫中国, 屠杀中

国民众的万恶强盗。……现在它更公开更强暴的占领中国土地,其明显的目的显然是掠夺中国,压迫中国工农革命,使中国完全变成它的殖民地。”《宣言》号召全国人民一致动员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2](第 1-4 页)“一·二八”事变后,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又提出实行民族革命战争,抗击日本侵略,号召全国工农兵及劳苦群众,“联合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被压迫民族与苏联,来实现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彻底争得中华民族真正的独立与解放。”1933 年日本侵入华北后,毛泽东和朱德又代表中华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合宣言,表示只要同意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立即保证民众的民权利,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等三条件,“中国工农红军准备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作战协定,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3](第 317, 318 页)由号召民众到联合一切愿意抗日军队共同抗日,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真诚联合一切抗日力量,共同抗日的强烈愿望。

1934 年 4 月 17 日,天羽声明发表,中国共产党立即于 4 月 20 日以“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的名义提出《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大声疾呼,中国已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生死关头”,“中国人民唯一自救和救国的方法,就是大家起来武装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强调“这是保障中国民族生存战争,这是拯救四万万人民的战争,这是为保障我国国家独立自主和领土完整的战争。”^[4](第 611 页)这个抗战纲领经宋庆龄、何香凝等 1 700 人签名后于 5 月发表,3 个月内,军、政、商、学、农、工界签名者达 30 万人,表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主张,反映了全国人民的最根本利益,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支持。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采取的则是另一种态度。他们以“不抵抗”主义出卖中国领土,以“逆来顺受”的态度屈从日本一切要求。早在 1927 年,蒋介石就溜到日本,和田中内阁搞了一次肮脏的政治交易:“日本承认由反共反苏的国民党统一中国,中国(指蒋介石)则承认日本在东北的特殊地位”。“九·一八”事变前,日军不断在东北挑衅,蒋介石电令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挑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1](第 24 页)“九·一八”事变当晚,张学良在一夜之间 10 多次电蒋请示,蒋却 10 多次复电“不准抵抗”。当时日本的关东军加上宪兵只 10 000 多人;而东北驻防军与地方武装共有 30 多万,挫败日本侵略并不困难。结果却因蒋介石坚持不抵抗,致使日军在 4 个多月内就轻易占领东北全境。“一·二八”事变后,第十九路军和第五军浴血奋战 33 天,以 40 000 多军队抗击日军 70 000 多人。日军三易主帅,死伤 10 264 人。驻在上海周围的 60 个国民党嫡系师却不予支援,以致数次失去全歼日军良机。后来由于英美害怕伤及本身利益,积极促成停战,双方才签订了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淞沪停战协定》,允许日军长驻闸北、吴淞等地,为日军后来大举进犯提供了基地。

1933 年,日军继续向长城内外侵犯。由于蒋介石不派一兵支援,结果日军一路侵入河北,在冀东北连陷抚宁、遵化、滦县、密云等 22 县;另一路侵占察哈尔、多伦、沽源、宝昌、张北等城。蒋介石的妥协退让,造成大片国土沦丧,平津岌岌可危。最后只得在不许修改一字的屈辱条件下,与日本签订《塘沽停战协定》:中国军队“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之地区。尔后不越该线而前进,又不行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5](第 930 页)协定之外,中国代表熊斌还答允今后彻底取缔排日运动。此后两年,日本加紧对华北实施军事、政治、经济控制,蒋介石继续执行妥协退让政策,鼓吹“中日亲善”,与日本签订《何梅协定》、《秦土协定》,迫使中国军队从河北、察哈尔撤退,取消河北、察哈尔境内的国民党党部,取缔一切抗日官员。中国对河北、察哈尔的主权丧失殆尽。

上述事实表明,围绕日本侵华,中国共产党和蒋介石集团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中国共产党主张联合一切抗日力量,共同抗日;蒋介石却对日本侵略妥协退让,认敌为友,鼓吹“中日亲善”。态度不同,结果各异:中国共产党号召抗日,全国由此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高潮;蒋介石对日妥协退让,导致国土沦丧,国家陷入亡国绝境。

二、战胜千难万险,实现战略转移

蒋介石对日本侵略推行不抵抗主义,对坚持抗日的工农红军却要竭尽全力剿灭。他要消灭红军,固然出于他的反动本性,同时是奉行日本帝国主义旨意。当他1927年赴日本和田中密谈时,田中就对他说:“反对共产主义的您如能巩固南方,这对日本来说乃是最大的希望。……日本对此必将给予最大限度的援助。”原来,蒋介石要消灭共产党,实是充当了日本侵华的帮凶,为日本征服中国扫除障碍,用心十分阴毒。蒋介石消灭工农红军的借口,是“攘外必先安内”。他公开说:“我们的敌人不是倭寇而是土匪(按:指红军)”。还把日本侵略比作“皮肤小病”,将工农红军视为“心腹之患”,这完全是欺人之谈。试问,日本要灭亡中国,要4万万中国人当亡国奴,还只是“皮肤小病”吗?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坚持抗日救国,一心为国为民,反而是“心腹之患”吗?这完全是颠倒黑白的强盗逻辑。实际上,蒋介石卖国求存,导致国土沦丧,人民流亡,才是中国真正的“心腹之患”。他的说教,荒谬绝伦,不值一驳。当年他即以此为借口,对工农红军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围剿”。

蒋介石打着“攘外必先安内”的旗号,从1930年12月到1933年3月,在两年多时间内,连续调集10万、20万、30万、5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红军发动了4次“围剿”。红军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指挥下,采取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等策略,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敌人的“围剿”,共计歼敌约10万人,缴枪6万多支。蒋介石在4次“围剿”均遭惨败之后,不但毫无悔改之心,反而更加疯狂。1933年4月10日,他在南昌对各将领说:“中正来赣督剿,实本有匪无我,有我无匪之决心,凡我剿匪将领,嗣后再以北上抗日请命,而无决心剿匪者,当视为贪生怕死之辈,立斩无赦。”^[9](第112页)他总结历次失败教训,决心采取更严厉措施,发誓消灭红军。国民党将士屡遭失败之后,垂头丧气。他先后发表14次演说,为他们打气。为了强化地方统治,他加强地方武装与保甲制度,实行“连坐法”。经济上则实行严格封锁政策,不让一粒米、一撮盐、一尺布流进苏区。为了筹集军费,他大量举借内外债和发行纸币,竟然不惜签订卖国的《塘沽协定》,换取日本两亿日元的贷款^[7](第360页)。军事上则改革军队编制,改变战略战术,广建碉堡,稳扎稳打。从1933年秋起,调集50万兵力,向中央苏区发动第5次“围剿”。

敌人采用堡垒战术,到1934年1月,已在江西筑起4000多个碉堡,向中央苏区逐步推进。红军阵地日益缩小,已无法从内线打败敌人。此时,毛泽东建议,红军主力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将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迫使敌人回援浙江,才能粉碎敌人的围剿^[8](第236页)。彭德怀也有同样看法。可是,红军的指挥权此时已落到新来的德国顾问李德手中。他在博古(秦邦宪)支持下,实行单纯防御,采取以堡垒对堡垒、处处设防、节节抵御等错误作战方针,完全背离了前四次的有效作战方略。结果屡吃败仗,元气大伤。到了1934年9月末,中央苏区已由原来的28县区缩小到只剩瑞金、会昌、于都、长汀等少数县份。在这种形势下,为了避免全军覆没,惟一出路就是突出重围,实行战略转移。

离开经营多年的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使红军避免了被“剿尽杀绝”的命运。但前进的道路上,依然荆棘丛生,困难重重,稍有不慎,仍有全军覆亡的危险。不过红军是铁打的英雄汉,尽管征途上遇到千难万险,最后还是被一一征服了,实现了伟大的战略转移。

首先是英勇机智,战胜敌人的围追堵截。红军突围后,蒋介石凭借兵力和物力上的绝对优势,穷追不舍。红军每前进一步,几乎都要经过艰苦的斗争。据统计,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1934年10月从江西出发到1935年10月抵达陕北。在一年的时间里,共进行了380多次战斗。红军在长征途中,天上几乎每天有几十架飞机跟踪侦察轰炸,地上有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红军一突围西征,就遇到敌人设置在粤赣湘桂边境的四道封锁线。蒋介石调集40万军队,布防于湘江两岸,妄图将红军“聚歼”于湘江以东。红军渡过湘江后,蒋介石估计其将沿湘西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于是紧急调遣15个师的兵力,在武冈、城步、绥宁、靖县一带抢修碉堡,扼守要道,命国民党军和桂军跟踪追击,企图把红军歼灭于湘桂边境。蒋介石复调150多个团的兵力,从四面八方合围,妄图把缩编后的红军16个团围歼于川黔

边境。他急调川军40个团封锁金沙江,阻止红军渡江。1935年5月,红军渡过金沙江后,蒋介石又调动10多万兵力,准备把红军“根本消灭”于大渡河畔,成为“石达开第二”。然而,红军毕竟不是石达开,不但渡过了大渡河,而且在川康边境屡次挫败了敌人的堵截,于1935年9月由川北进入甘肃地区。此时,民族危机更加严重,蒋介石仍然置国家危亡于不顾,自任西北“剿匪”总司令,以张学良为副总司令,并由张学良代行总司令职权,调集国民党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共30多万人对红军进行“围剿”。红军再次面临覆灭的危机。只是由于红军给予了围剿军以沉重打击,加上东北军、西北军在全国抗日怒潮的影响下,在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劝说下,觉悟到需要联合抗日,共赴国难,才最后迫使蒋介石放弃了“围剿”。

当时红军与国民党军队的军力有天壤之别。红军为什么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最根本的原因是,红军是一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一心为了救国救民的队伍,是中华民族精英。他们有最大的勇敢,也有高度的机智。正是凭着英勇与机智,才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围剿”。1934年11月27日,红一师和红四师在广西兴安与全州间突破了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渡过了湘江,控制了界首到觉山之间的渡河点。为了保卫中央纵队安全渡过湘江,必须坚守觉山、界首和灌阳新圩等战略要地。负责守卫的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与十倍于红军的湘军、桂军及国民党中央军激战5昼夜,每天都顶住敌机的狂轰滥炸,打退敌人无数次进攻,即使阵地“被敌人打得稀巴烂,第一道工事连影子也没有了,山上松树也只剩下枝杆”^[9](第89页),阵地仍是岿然不动。直到12月1日中央纵队安全渡过湘江与湘桂公路,守卫部队才奉命撤离,走上新的征途。

红军战胜国民党的围追堵截,固然靠英勇无畏,更靠灵活机智。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队伍已损失大半,战斗力空前削弱,大家已极度疲劳。指挥红军的李德,仍执意要沿湘西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这无异钻进敌人早已准备好的口袋去送死。幸亏毛泽东在通道会议上及时建议,改向敌人防守薄弱的贵州进军,才避免了全军覆灭。1935年1月,红军进入黔川边境,如果仍然像突破湘江防线那样硬打硬拼,以缩编16个团的兵力对抗敌人150个团,即使不是全军覆没,必将造成重大伤亡。好在此时召开了遵义会议,清算了王明、博古的“左”倾路线,调整了领导班子,才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此后,在毛泽东、周恩来等指挥下,红军以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化被动为主动,四渡赤水,再占遵义,佯攻贵阳,西袭昆明,终于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于5月9日胜利渡过金沙江。这主要是以机智胜敌。而渡过大渡河,则可说是英勇与机智结合的典范。没有红军的英勇,一天怎能跑240里?哪会有17勇士强渡大渡河?哪会有22英雄飞夺泸定桥?而没有中央革军委的英明果断决策,就不会有日行240里的急行军。

其次是治病救人,纠正党内的错误路线。第5次反“围剿”以来,由于以博古为首的党中央,“拒绝了解任何的特殊情况,拒绝红军血战史的经验,轻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力量,轻视国民党军队的力量,对敌人采用的新战术视若无睹。结果,是丧失了除了陕甘边区以外的一切革命根据地,使红军由三十万人降到了几万人,使中国共产党由三十万党员降到了几万党员,而在国民党区域的党组织几乎全部丧失。”^[8](第187页)长征初期,他们继续执行错误路线。出征之前,对长征决策秘而不宣,大家被蒙在鼓里。即使谁走谁留,也未认真研究。起初连毛泽东都不带走。后来考虑他是中华苏维埃主席,才改为随军转移。实践表明,当时如果毛泽东真被留下,长征前途将不堪设想。决定长征后,又不向群众进行动员,无法发挥大家积极性。特别是对行军中的困难毫无思想准备,把许多笨重机器及非必要物件一齐带走,严重影响行军速度,以致强渡湘江时,由于行动迟缓,错过了渡江的最佳时机,致使掩护渡江的红军造成惨重损失。红八军团出发时有10992人,渡过湘江后只剩1000人。红五军团34师负责总掩护,走在全队最后,正准备渡江时,被敌人重重包围,最后打到只剩下200人突围。红三军团第18团也未能渡过湘江。

血的教训擦亮了大家的眼睛,广大共产党员与红军将士逐渐认识到错误路线的严重危害,纷纷要求纠正。在中央政治局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许多中央领导人,纷纷利用各种场合,对错误路线不断提出批评。到了遵义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又从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及长征以来军

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入手，对错误路线进行了系统清算，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决议除批判了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错误，还严肃批判了李德、博古等在组织路线和领导作风方面的错误。通过清算错误路线提高了大家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了李德、博古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常委会内由洛甫（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后来在行军途中，为便于统一指挥，又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指挥小组，对军事行动实行集中领导。自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央一直未形成一个正确的领导核心，致使革命不是犯右倾投降错误，就是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导致革命屡遭失败。遵义会议采取治病救人方针，从提高思想路线认识入手，进而解决组织路线问题，逐步形成一个正确的领导核心。遵义会议成为中国革命由失败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点。

纠正“左”倾路线不久，党内又发生张国焘的右倾逃跑主义。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在懋功（今小金川）会师，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开会，确定两军会合后继续北上，开辟川陕甘根据地。8月初，又决定红军分左右两路过草地北上。右路由毛泽东、周恩来率领，左路由朱德、张国焘领导。当时一方面军只剩1万多人，四方面军号称8万人。张国焘作为四方面军主要负责人，凭着人多枪多，公开与党中央闹分裂。他以躲避敌人优势兵力为由，不但不让左路军过草地，而且秘密电告已过草地的右路军中原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嘱他率军再过草地南下。红军总参谋长叶剑英得知，即刻禀告党中央，毛泽东、周恩来等研究后，迅即决定率左路军中的一方面军一、三军团连夜离开险地，改为“北上先遣支队”，紧急北上。陈昌浩得信后准备派军截击。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愤慨地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才制止了这一不幸事件发生。

张国焘率领红四方面军及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南下再过夹金山，于1935年1月攻占川康边境地区。国民党军队立即调集80个团进行围攻。红军与国民党军在川康边境搏斗3个多月，虽然歼敌两三万人，红军也减少到只4万人，被迫向西康西部甘孜等地转移。张国焘分裂红军南下期间，还另立中央，破坏了党的统一。党中央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进行了耐心的说服与教育，严肃批评了他的逃跑主义路线和宗派活动。张国焘率军南下屡遭失败之后，四方面军的广大官兵逐渐有所觉悟，后来由于朱德、刘伯承及前去与红四方面军汇合的红二方面军任弼时、贺龙的规劝，他才回心转意，宣布取消伪中央，同意北上。不过，经过一年的折腾，红军损失已十分惨重，到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时，全军已不足3万人。党内错误路线给革命事业造成何等严重祸害，于此可见一斑。

第三，舍己助人，共度生死难关。长征途中，红军食不果腹，衣不蔽体，饥冻致毙者，日有所闻。红军经过之地，多是极端贫困地区。衣食住行，经常遇到令人难以想象的困难。贫困地区长期缺粮，要在当地筹得大批粮食，几乎难于登天。特别是进入川康边境，人烟稀少，当地民众吃的是低产的青稞，筹粮益发艰难。红军过雪山草地，不少战士就因饥寒致死。为了拯救同志的生命，许多人舍己助人，谱写了无数令人感激涕零的动人事迹。收容队员萧新书，登雪山时，身上仅存一块银元大小的干粮，几次饿得想吃都舍不得，准备饿得爬不动时再吃。当到达雪山顶时，掉队的同志很多。有的很快就失去了生命；有的起来倒下，倒下又起来挣扎着。他赶忙把没舍得吃的那块干粮掏出来，送给倒在他身旁的一个同志。“那个同志接过干粮，可是他只咬了一口，又递给旁边的一个同志。这样，一块银元大的干粮，传了几个人才吃完。”^[9]（第545页）经过荒无人烟的茫茫草地，要走六七天，粮食益发困难。因为筹不到粮，每人每天只配发2两半炒熟的青稞。肚子饿得难忍，只有采摘野菜充饥。野菜吃光，就煮牛皮带吃。草地上的水，腐臭有毒，半数的人因此染上疾病，不是饿死就是病死。时年不到20岁的胡耀邦，原是红三军团收容队的负责人，由于饥寒交加，快走出草地时，疟疾复发，晕倒在一条沟边。不知过了多久，他看到表哥杨勇骑马过来，呼喊求援。杨勇原是红三军十团政委，因负重伤才骑马随休养团行走。他听到呼唤声，发现是胡耀邦，立刻把他扶上马，自己则忍痛牵马随行。要不是巧遇杨勇，也许就没有后来的胡耀邦了^[10]（第58页）。

疾病对于长征战士，是又一种生死威胁。由于生活条件极差，抵抗力减弱，是易招致疾病。红军经

过的南方各省,蚊蝇滋生,疾病尤易流传。长征途中,红军将士患疟疾痢疾者,屡见不鲜。因疾病致死者,不计其数。毛泽东在长征出发前,就染上恶性疟疾,“高烧40度,嘴唇干裂,两眼深凹,脸颊烧得通红。卫生员给他奎宁片,打奎宁针,高烧依然不退”。红军医院院长傅连璋赶来诊断,经过精心治疗与护理,病情才慢慢好转^[1](第330页)。周恩来主持军委工作,经常通宵不眠,白天照样和大家一起行军,饮食上和大家都吃青稞与野菜。由于操劳过度,到快过草地时,终于支持不住病倒了。连续几天高烧,五六天不吃东西,原以为患了疟疾,后来才诊断为阿米巴肝脓肿。为了使他过草地,彭德怀果断决定,专门组织担架队,陈赓自告奋勇,亲任队长,兵站部部长兼政委杨立三坚持亲抬担架,才把他和早就受伤的王稼祥抬过草地。长征中这类舍己救人的事迹,不胜枚举。正是同志间饥饿互救济,疾病相扶持,才保证了长征的胜利。

最后,排除万难,征服长征途中的艰难险阻。红军为了避开敌人,走的都是山间小道,而且经常碰到敌人狙击。一天两天容易,成年累月如此,实有说不尽的艰辛。特别是过雪山草地,路就更难走了。夹金山海拔4900多米,一上一下70里。山上高寒缺氧,气候变化无常。红军过雪山时,正是6月大热天,山下赤日炎炎,汗流浹背;山上白雪皑皑,寒气刺骨。越是接近山顶,山势越发陡峭,道路更加崎岖。雪水浸透了草鞋,十个脚趾冻得通红。“空气也越来越稀薄了。胸口上好像压着千斤重担,透不过气来,走几步就得喘半天。”到了山顶,一块乌云“迅速挨着山头压过来。接着暴雨夹着冰雹,劈头盖脸地打来,不一会又变成鹅毛大雪。真是瞬息万变。我们身上的单军衣被浸透了,有的地方还结了一层薄冰,冷风一吹,把大家冻得上牙直打下牙。”“脚陷在一尺多深的雪里,费老劲才能拔出来。”他们因而深有感慨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这简直比蜀道还难!”^[9](第539-541页)

长征路上最艰难的,是过草地。位于四川北部的松潘草地,方圆几百公里,除了无边无际的野草之外,没有一棵树木,没有一块石头,也没有飞鸟,更没有人烟。草地下的泥沼,野草覆盖,深浅莫测。稍有不慎,掉进泥潭,越陷越深,就有生命危险。草地空气稀薄,气候多变。“时而狂风四起,大雨滂沱;时而漫天飞雪,冰雹骤降。”红三军团走了6天6夜,终于走出草地,到达班佑。不少战士在途中倒下了。四方面军第四、三十军,由于张国焘闹分裂,曾经三过草地,数次翻过大雪山,牺牲更大。据第四军军长许世友回忆,1936年第三次过草地前,为适应过草地时打敌骑兵、侦察道路、筹集粮食的需要,上级要他组建了一个骑兵师,下辖3个团共3500人,由他任司令。1936年6、7月两月,这个骑兵师经过72次战斗,最后只剩两百多人。一个3500人的骑兵师,仅剩200多人。其伤亡之大,可想而知。

但是,工农红军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英勇队伍,不管经历了多少挫折,付出了多大牺牲,最后终于以超乎寻常的英勇机智及毅力,战胜了重重的围追堵截,征服了千难万险,实现了战略大转移,这是一个空前巨大的胜利。

三、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

红军长征,从中国工农红军本身的发展来说,是一次生死存亡的最严峻的考验。蒋介石连续对红军发动五次“围剿”,目的就是彻底铲除红军。红军被迫突围长征,蒋介石一次又一次地组织大过红军七八倍以致十多倍的兵力进行围追堵截,目的仍在把红军剿尽杀绝。红军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以无比的英勇与机智,粉碎了占绝对优势的敌人的一次又一次追剿,最后胜利实现了战略转移,这在古今中外的军事战争史上,是没有先例的,称得上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绝唱。她的光辉将永远照耀人间,彪炳史册。

红军长征胜利,使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斗争实现了战略大转移,把抗日救国斗争推进到新阶段。此前,中国革命的重心在南方;此后,中国革命和抗日的重心移到了华北。当时日本侵略势力已深入到陕西北边的绥远和东部的山西境内。红军到达陕北,接近前线,更有利于担当起领导全国人民共同抗日的重任。同时,有利于深入敌后抗击日本侵略,为后来推进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大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

红军实现战略大转移,实际成了抗日救亡的新起点。自从“九·一八”事变起,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

的红军,一直高举着抗日的旗帜,一再呼吁全国军民联合起来,共同抗日。由于蒋介石死心塌地要消灭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共产党被迫走上“抗日反蒋”的道路。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剧变,国际上正在组织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国内也需要组织更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所以,共产党为了争取蒋介石加入抗日队伍,也调整了对蒋政策,由“抗日反蒋”转变为“逼蒋抗日”。早在1935年8月1日,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共中央就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郑重宣布:“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动,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到达陕北后,就把抗日救国作为最紧迫的任务,通过各种形式,组织和动员全国各阶层各集团投入抗日运动。针对国民党对共产党与红军采取剿抚两手新策略,共产党也采取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策略,最后通过正确处理“西安事变”,达到了“逼蒋抗日”的目的,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把全国抗日斗争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参 考 文 献]

- [1] 冯玉祥. 复蒋介石电[G]. 蒋冯书简. 北京: 中国文化信托服务社.
- [2] 中央统战部, 等. 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C].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 北京: 档案出版社, 1984.
- [3] 万 峰. 九·一八事变的前前后后[N]. 人民日报, 1961-09-17.
- [4]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文史资料选辑: 第6辑[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 [5] 王铁崖. 中外旧约章汇编: 第3册[M]. 北京: 三联书店, 1982.
- [6] 王桧林. 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言论摘录[G]. 中国现代史参考资料.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8.
- [7] 周天度, 等. 中华民国史: 第3编第2卷: 上[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 [8]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 [9] 何 诚. 阻击在湘江之滨. 回顾长征[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5.
- [10] 张黎群, 等. 胡耀邦传(1915—1976)[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5.
- [11] 金冲及. 毛泽东传(1893—1949)[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责任编辑 桂 莉)

The Red Army's Long March: Chinese's Pioneering Work

XIAO Zhizhi

(School of Histor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XIAO Zhizhi (1929-), male, Professor, School of History,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Chinese history.

Abstract: The Red Army's Long March is an unprecedented pioneering work in the Chinese history. This article emphasizes the Red Army overcoming multitudinous difficulties, comminuting the besiegment and assault from Kuomintang. Finally, the Red Army which set out from the South of Jiangxi province, arrive the North of Shanxi province, and successfully complete the strategic shift, which make the Anti-Japan war enter a new phase.

Key words: the Red Army's Long March; the Chinese nation; the strategic shift